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英] 拉曼·塞尔登 彼得·威德森 彼得·布鲁克/著
刘象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英] 拉曼·塞尔登
彼得·威德森 著
彼得·布鲁克
刘象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3-20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英)塞尔登等著;刘象愚译.—5 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ISBN 7-301-11363-3

I. 当… II. ①塞… ②刘…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0106 号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 Prentice Hall Europe 1985, 1997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书 名：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 5 版）

著作责任者：〔英〕拉曼·塞尔登等 著 刘象愚 译

责任编辑：刘 爽

标准书号：ISBN 7-301-11363-3/I · 084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30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

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钱、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兼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

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译者前言

20世纪后半期是一个理论的时代，各种理论流派迅速更迭演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一种热烈绚烂的景象。理论从哲学汲取营养，以文学批评为依托，逐渐从文学理论膨胀为文化理论，涵盖了广义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且一种理论一旦诞生之后，立即开始在全球“旅行”，对20世纪的学术界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一些论者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后理论”时代，但对于学者和学术研究，理论却依然十分重要，不可或缺。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帮助学者了解这些理论的各种导读、读本、关键词、辞典等应运而生。在西方众多的“导读”中，由英国已故著名教授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和另外两位著名教授彼得·威德森(Peter Widdowson)、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er)联袂撰写的这本《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是最精彩的一种，它内容全面、丰厚，涉及了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直到20世纪末的同性恋、酷儿理论等十余个重要流派。此外，它对各家各派的分析鞭辟入里，文字平实清通，不仅适用于学者，也适用于广大读者，因此，自1985年第1版问世以来的20年间，已经发行第5版(2005)，一直被许多高校用作文学理论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在学术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提出“后理论”时代的一些学者其实未必全然反对理论，而是反对近数十年来理论逐渐走向空泛，脱离文学和文化研究实践的倾向，或者说反对理论背离传统审美批评，背离经典文本分析的倾向。就各种理论流派本身而言，虽然它们中的一部分从20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盛行到 90 年代以来的逐渐式微，到今天似乎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依旧是各种后起的新理论诞生的前导和基础，依然和这些新理论有着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譬如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对“后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的倚重和继承；“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与“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新近出现的“发生学批评”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不无关联，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尚未产生但将会产生的更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与这些理论完全切断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理论并未也不会“过时”，它们将为理论的演化作历史的见证，对现在和未来发生影响。这本书在一年前刚刚发行了第 5 版，这个事实不仅说明了这本《导读》影响之大，也说明现在社会各界对理论的需求仍未“过时”。

有论者指出这类书的不足，以为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而且越是好的“导读”越可能误导读者，使他们忘记了原作。这种意见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再好的“导读”也是作者对原著的一种个人读解，不可能没有读解者个人的、主观的印记，因此，它绝不可能代替对原著的研读。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在“引论”中明确地表态说：“《导读》无论如何是不能取代理论原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类书对于那些没有条件阅读繁纷复杂、浩如烟海的理论原著的读者来说，又不失为了解当代理论基本面貌的一条便捷途径；而对于那些有志于钻研理论的读者，则无疑可以引导他们更好地进入原作，显而易见，这类书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这本《导读》二十多年来多次印行，始终占据着高校的讲堂，具有崇高的学术声誉，许多学者和读者都把它作为最好的当代理论入门书使用，我们在近些年的博士班讨论课上也将它列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在与学生们共同的研习讨论中，译者已在一年

前将它的第4版(1997)译成中文。就在这个译本即将交出版社刊行之际,它的第5版又问世了。于是,译者只得依据新版本校订译作。原以为第5版只是增加了“后理论”一章,修改了“导论”部分,但在校订的过程中才发现,此版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删,尤以“后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后6章改动为最大,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批评家或理论家都有所增删,在这种情况下,译校的工作量极度增加,实际上,译者几乎又重译了一次。

译者仍然本着自己在理论类著作翻译中的一贯原则,对原作中的“书目”保留而不移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那些打算进一步研读原著的读者能够顺利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原著及其他参考书版本。译者也真诚地希望并相信,本书的内容不仅能为那些暂时没有条件阅读原著的读者,而且也能为那些有条件阅读原著的读者提供导引的便利。

总序

多方位地吸纳 有深度地开采

——写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出版之际

周启超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不妨也来对我们的国外同行当下的所思所为作一番检阅——对当下国外文论的态势与现状作一次勘察。这并不是要与西方“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下国外文论的态势与现状，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地借鉴，多元素地吸纳，才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那么，国外同行当下的所思所为中有哪些新的情况？他们都在以“理论终结”、“文论死亡”的言说而在为“文学理论”送葬？或者，都还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替天行道”而流连忘返？今日国外文论有没有出现别样的气象？有没有出现什么值得关注的“转向”？这个问题自然可从不同角度来切入。不同的视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视像。“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构”——则是我们从对今日国外同行的所思所为的一番检阅之中获得的一个最为强烈的印象。

反思的激情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祥地德国，今日的文学理论在“执著于自身的历史”。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其源头在哪里？它恐怕还并不像有些学者认定的那样是苏联人的“发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其实乃创始于德国，源生于并比较完善地表述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肇始于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以及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其他批评家的实践。早在 1842 年，德国学者卡尔·罗森克莱茨就著有《1836—1832 的德国文学学》，这要比俄罗斯学者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1925

年初版)早 83 年,比勒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2 年初版)则早了整整一百年。那么,文学理论在今日德国的现状如何?汉斯·古姆布莱希特在其题为《文学学的源头与其终结》(1998)一文中指出,“在其作为一门学科几近两百年的存在中,文学学还从没有像近十年这样执著于自身的历史”。^①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重镇俄罗斯,“文学学”本身的历程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俄罗斯文论界的学者普遍认为,文学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反思自身的历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其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1993)中提出,文学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应当研究自身的歷史,而且应当是以迄今为止所不可能比拟的规模来做这件事”^②。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的谢尔盖·森金教授在其 2002 年的一篇《理论札记》中写道:“今天,最有价值的,倒不是革命性的学说,而宁可是在理论史方面有学识很在行的工作——进行总结,应对那些具有观念性的关联与根基加以梳理,将大师们的未尽之言说透,将大师们未曾点破的东西说穿。”^③

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想的策源地法国,“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得到审视。反思中的法国文论家看到,当代文论的运行类似于钟摆式的摆动。今日文论专注于意识的分析、主体的分析、思想的分析——此乃昔日社会学批评之复活;此乃对巴特式的阅读解析——将阅读看成是主体与客体之相遇过程——的一种反拨。当代文论运行于悖论之中。安东·孔帕尼翁在分析今日文论现状时

^① H. U. Gumbrecht, *The Origins of Literary Studies—and the End*; 转引自《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3 年第 1 期。

^② A. B. Михайлов:《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语境 1993》,莫斯科,1996 年,第 12 页。

^③ С. Зенкин:《理论札记》,《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2 年第 1 期。

指出,恰恰是当代法国文论剥夺了文学本身的合法性,恰恰是当代法国理论抛弃了仅仅在法国才保留下来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典律。今日文论的困境产生于文论尚未稳定、尚处于确立的阶段。如此看来,文学理论远未终结。1999年,法国学者与加拿大学者建立了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网站,发布文学理论研究的信息。1999年5月在巴黎七大召开过“文学理论究竟是什么?”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表明,当下治文论的学者分为两组,路向可分为三条。所谓两组学者:一组执著地寻找对理论的准确界说,致力于建构理论文本的大厦,确定基本的理论原则;另一组则视文学理论为一种元批评文本,对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阶段加以分析。所谓三条路经:其一是继续研制文本理论;其二是相应于对方法的新的界说而重构理论场;其三是对于文学理论加以历史的考察。

在一向抵制理论而以其实证主义传统著称的英国,针对过度的解构的反击正在出现。有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97)对当代理论的不断分裂与重组加以梳理:既看到“后现代理论裂变”——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为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而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又看到“大质疑大解构之后的大反思大建构”——一种向表面上更传统的立场的转向:那些经过理论历练而希望站在文学本身的立场上向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的统治发起挑战的年轻一代学人,希望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道路。^①有学者(安德鲁·鲍伊《对德国哲学与英国批评理论之调解》,1997)指出:过度的后结构主义现在正在导致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一种反击,以致过去20年中(1977—1997)某些最有影响的理论正在受到近乎于轻蔑的对待,这种对待不只来自无论

^① R. Selden, P. Widdowson, P.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ourth Edition, pp. 7—8, London and New York: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如何总是反对这些理论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多来自原先对这些理论有某种同情的人。伦敦大学的这位教授认为，现在是停止仅仅专注于解构文学文本的时候了。那种解构假定了这些文本对社会具有比它们实际所具有的更大的影响。艺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① 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 1999)一书中着手对文学这一概念的演变轨迹加以清理，对“文学”、“文学价值”、“典范”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内涵的增生与变异加以反思：在 20 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然大成问题了。要么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canonical); 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彼得·威德森提出，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② 正因为这样，他才同意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下说法：“文学的确应当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是，这种文化生产的每一种样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号学，因此也就不会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话语。”

彼得·威德森注意到，理论的位能导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通过界定以及他们对构成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进行“客观性”研究这两种有效处理的景观。现代文论提出，文学文本事实上都在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行为中进行“重写”，而这并非依靠专业分析的过程，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这正如文本写完和印刷之后作者对文本的控制和权威也就因此放弃了一样，所以读者所处的阅读地位无论是在整

^① A. Bowie, J. Enkemann, *Mediating Germa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Britain*; 转引自《差异》第 2 辑，周晓亮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75—276 页。

^② P. Widdowson, *Literature*, p.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个历史中还是在其所处文化位置的任何既定时刻，都是十分不同的；所谓“文本”也就成为了上述种种差异的产物。那么，这“重写”、这“重构”一直以来究竟是怎样的，尤其是过去三十年前后的情况如何，怎么给予比较充分的理论批评说明？

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文学观念的行程，即“文学”的基本意义在过去是怎么建构的，而现在又是怎么解构的。在彼得·威德森看来，答案就在于什么是这种建构与这番解构的真正的目的和动力——“文学”包括“有文学性的”(the literary)是过于深入人心，而被过度消费了。这就有必要从历史语源学的角度来谈论“文学”的行程与优势，以及晚近是如何对其解构和置换的。有必要对“有文学性的”进行再界定并重建其信誉，设法表明所谓“自由空间”在如今的文化主流话语、文化生产形式与交流方式中有什么用处，而且不复有原初的“有文学性的”。有必要去证明文学的用途，去表明来自于以往的文学可以继续给我们提供某种“特殊知识”形式；特别是什么样的关于我们自身文化的“新闻”可以依靠当代文学—新闻得到传播，否则的话就会毫无意义，除非是在其文学性表述的具体文本中得以释放。^①也就是说，要反思、要梳理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要针对“消解历史”而来展开“再历史化”，要针对“解构”来展开“重建”。文学理论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中推进的。

即便是在文化批评仍大有市场、文化研究势头似乎不见衰减的美国，也还有另一些声音，出现了新的迹象——传来要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呼唤与主张。有学者看到：“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著有《在新批评之后》的弗兰克·兰特里夏）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

^① P. Widdowson, *Literature*, p. 14.

‘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①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03 年的年度报告也提倡“文学性”，将之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比较文学不仅要“比较地”研究国族文学，更要“文学地”阅读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的文学性阅读要求对研究的对象做仔细的文本考察，并具有“元理论”(meta-theoretical) 的意识。^② 即便是被尊为“文化批评大师”的爱德华·赛义德后来也认为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征途。^③ 自然，有心人也不会忘却，在所谓文学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大潮中捍卫文学本体研究的“保守派”，即便在大尚“解构”的美国文论界，其实也一直是不乏其人，甚至还有颇有权威的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少有勒内·韦勒克(《对文学的非难及其他论文》，1982)；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至少有哈罗德·布罗姆(《西方典范》，1994)。

梳理的路径

正是这种反思的激情在推动着“文学学”历程的审视与检阅，在推动着对“文学”行程的梳理、对“文学理论”行程的梳理、对“文学学”历史运行轨迹与当下发育态势的梳理。梳理文学是如何被解构为大写的文学与小写的文学；梳理文论是如何被解构为“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目前，这种梳理主要是在以下几个路径上进行。

路径 1 梳理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轨迹。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看到，事到如今，即使是最彻底的文学批评家也不会轻易接受那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了，或是认为关于文学这个概念只能有一种基本定义，即只存在某种

① 李欧梵为勒内·韦勒克与奥斯卡·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文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所写的总序(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7 页。

② 张英进：《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比较文学报》2004.9.25。

③ 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 年第 6 期。

天生的、自我确证的文学“要素”的定义。事实上，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学而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文学。对不同的人来说，文学乃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尽管这是默认的、下意识的，或是不会公开承认的，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一点。

如今，有大写的、不带引号的“文学”，也有小写的、带引号的“文学”。前者在这里表明的是一种具有全球性文学写作实体的概念；而后者的意思不过是表明那些不太注意鉴别的文集大全尚有些文学性可言，其实属于相对于“创造性”或“想象性”写作这种人工技巧而言的不同领域，不过是写作性交流的一种远为平凡普通的形式。

如今，在大写的“文学”中实际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学，批评的注意力正是集中在这种以复数形态存在的文学上；小写的“文学”是在批评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大写的“文学”则完全是由批评“创造”出来的。正是文学批评选取、评估和提升了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又同样地再被分配安置。也正是由文学批评或多或少明确地去测定作品的特质，那些构成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的特色。换句话说，所谓“文学”，其实是按照文学批评所设想的形象来“建构”而“制作”出来的。

路径 2 梳理当代文学理论的不同范式。

法国学者安东·孔帕尼翁——罗兰·巴特的弟子，曾在索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文学理论，主张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区分开来，而批评“文学的理论”之自杀性的极端主义；孔帕尼翁所说的“文学理论”，指的是普通文学学与比较文学学的一个分支，是在文学研究这门学问的整个历史中一直与之相伴随的一种学术话语；而他所谓的“文学的理论”，则首先指的是法国的“新批评”学说，一部分也指美国的“新批评”学说。这种“文学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①。安

^① A. Compagnon, *Le Demon de la Theorie* (1998); 转引自俄译本《理论之魔》，莫斯科，2001年，第27页。